

创业必修课：理想距现实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陈彬

日前,据媒体报道,今年拥有52万高校毕业生的山东省出现了一个景观:省内高校纷纷加大创业教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分量,将其由选修课调整为必修课,这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应该说,山东省部分高校的改革虽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在1年前的8月1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要求各高校应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推动高校创业教育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山东省高校此次改革更多的是依照要求而行。

整整一年已过,教育部门的这一要求距离实现还有多远呢?至少从现实来看,这条路似乎还很长。

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此项政策公布之初,仅有湖北、河南、吉林以及江苏等不多的几个省份对省内高校作出了相关的要求,今年四五月份,又有重庆等地区对此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总体来看,各地对此反映平平。

事实上,从这一政策出台之初,对于目前高校是否有能力开办创业必修课的争议便已出现。如今已过去一年时间,当初的那些争议似乎也并未停止。

体系在哪里

卢强是山东某省属高校团委负责创业教育工作的老师。在此次山东省高校的“调课”风波中,他所在的高校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也正在研究这项工作,但距离正式实行还有一段距离。”

卢强表示,目前国内高校在创业教育上,一般采取的都是选修课形式,而一旦将“选”变“必”,改变的就远不止这一个字眼了。

“比如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就存在‘教什么’的问题。”他说,在原有课程体系中加上一门课程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创业教育牵扯的内容庞杂,如果单纯讲授单一内容就难以形成体系,而如果将所有内容罗列,又很容易做成表面文章。

“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课程体系。”卢强说。

在此问题上,近年来国内相关部门其实一直在进行探索。据长期关注创业教育的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团中央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导师路军介绍,目前全国范围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大体上有三个,一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起引进的KAB(Know About Business,意为“了解企业”)创业基础课程体系,旨在为学生讲授初级的创业相关知识,课程设置中游戏互动较多,比较生动有趣,但该体系的深度和创业实操性不足;二是劳动部负责完成的SYB课程体系,该体系主要是针对下岗职工的自主创业指导,缺点在于和大学教育的对接度不够;最后是教育部创业指导委员会正在依据去年发布的创业基础课程大纲编写的教材。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套比较切合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为各高校广泛接受的课程体系。”路军说。而当一堂课程没有适合自身的课程体系时,造成的后果便是课堂教学效果参差不齐。

“我们可以去看那些现在开设了创业必修课的学校,他们的课程有多少是千篇一律

“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套比较切合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为各高校广泛接受的课程体系。

培养学生走向创业道路,需要培养他们哪方面的能力素养,这与学校的定位是否吻合,这些问题考虑不清,即便开设必修课程,也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的。”在采访中,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坦言,创业教育并不是开设几个创业大讲堂,请几位创业精英讲讲课就能解决的,但国内很多高校的所谓“必修课”就是这样的。

对此,路军表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不健全,根源在于国内高校创业教育这个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创业教育的学术共同体”。“我们缺的就是这样一大批人——既有创业经验又有创业规律提炼、总结的学术素养——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理念能被大多数人承认。”实事求是地讲,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还属于一个幼稚学科,我们距离达成普遍共识还有一段距离。

对于路军的意见,卢强表示赞同。“课程体系缺失的背后,其实是师资的缺失,任何课程体系都是人来完成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师资状况又如何呢?

师资在哪里

“针对目前国内的高教规模,要全面实现创业教育的必修课,我们的师资规模至少要扩充30倍。”对于师资问题,路军直言不讳。

事实上,教育部的此项规定刚一出台,师资不足就成为了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图片来源:全景网

据了解,早在2005年8月,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起,引自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大学生KAB创业教育项目就在全国实施,其核心内容是培养大中专学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经过7年的发展,目前该项目已经培养了近5000名KAB项目讲师,而这些教师就成为了为高校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的基本师资队伍。但是,面对目前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仅靠KAB项目培养的几千名师资,显然难以满足需求。

以卢强所在的高校为例,该校目前有本科生8000人,这样的本科生人数在国内高校中属于中等。按照100人开设一堂“大课”计算,该校所需要的创业课教师数量约为30-40人。而现阶段,很多学校的创业教师可能只有一两人,甚至完全由就业指导中心教师兼任。

面对教师不足的问题,很多高校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大量聘任校外企业家兼职。对此路军表示,企业家就自己的创业实战经验作一两次报告的现场效果不错,但讲座内容往往比较个性化,甚至有一些偏颇,非常不系统;此外,上海某些高校也曾采取网络视频的形式加以应对,但“这只是一次探索,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路军坦言,创业必修课还是要立足于高校自己的专职创业师资。

然而,在这方面,高校的工作遇到了很多现

实问题。

比如,目前国内高校中并没有与创业教育有关的专业设置,而高校师资的引进一般都是依托学科和专业完成的,高校很难仅仅因为一门课程来引进老师。再比如,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创业课程是由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在兼任,但对于这些人员是属于教学辅助人员还是教学研究人员,依然没有一个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0年5月,教育部就曾向各地下发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高校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在该意见中,教育部要求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教材建设,要求积极聘请创业成功人士、专家学者等做兼职教师,而对于本校教师的培养,则仅仅要求“支持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在师资培养的问题上,我们很多关系还没有理顺,这极大地影响到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而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靠时间就能解决的。”卢强说。

定位在哪里

如果说,课程体系缺乏的根源是师资缺乏,那么师资缺乏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几年前,曾有一名名牌大学学生毕业后,回到母校门口卖早点,而且小生意做得还不错。然而有校友对于这位学生的评价却是——丢脸。

“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我们的高校现在最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定位在哪里?我们对创业者的教育定位又在哪里?”在采访中,熊丙奇坦言,师资问题背后就是学校定位的问题,就是学校整体风格和办学氛围的问题。因为“有什么样的办学定位,有什么样的办学风格,就有什么样的老师”。

据熊丙奇介绍,在英美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学校从一开始就对创业教育有着比较清晰的定位,创业教育也要融入学校整体,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关注学生能力提升。而在这方面,国内高校的思考并不清晰。

“培养学生走向创业道路,需要培养他们哪方面的能力素养,这与学校的定位是否吻合,这些问题考虑不清,即便开设必修课程,也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熊丙奇说,比如创业的重要素质是质疑和批判精神,但我们的学校能够给学生多大的自主空间,能够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发表多少不同观点?

在采访中,熊丙奇坦言,从根本上讲,中国目前缺乏进行创业教育的根本因素。“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将创业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但前提是学校要有办学自主权,在此基础上自主地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并根据这一定位脚踏实地地做一些‘落地’的工作。”但现实是,我们的高校既缺乏办学自主权,又对自身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教育很容易被喊成口号,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

对此,熊丙奇表示,创业教育需要的不是政府“一刀切”式的行政干涉,而是应将自主权交还给高校,由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目前国内创业教育开展比较好的高校,并不是那些重点大学,反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一般性高校,这恰恰是因为其所受的政府制约较少,对自身的定位也较明确,值得我们思考。”熊丙奇说。(部分受访者均为化名)

人民大学试水本科生教学改革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理

眼下正是刚结束高考的学生们填报志愿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官方网站主页的美女毕业生可谓是一火了一把,网站短期访问量激增,还引致服务器短暂瘫痪。有批评声音称人大此举“庸俗化”,只为抢夺生源。其实,考生考虑填报某所学校,最为看重的,还是学校、专业、师资及其对于本科生的培养情况。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了该校的本科人才培养路线图,区别于以往考试型、学分制的培养模式,触动了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事实上,路线图所展示的一些改革理念和具体措施,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已经在人民大学的某些学院进行了初步探索。

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本科生在专业选择时存在一个普遍问题——高考后对专业的选择比较盲目,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了解。在学生们看来,有所接触和了解,再考虑自身兴趣进行选择,可能更为理想。所以,在人才培养中,应当充分赋予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权力和机会,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龙永红表示,信息学院理科试验班的探索与实践,正是“以学生为本”。

龙永红介绍道,学院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打通信息学院各个专业(2009级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2010级增加信息安全专业)的招生与培养,在招生时统一以中国人民大学理科试验

班(信息与数学)招生,在培养学生共同的专业基础后再由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形成专业,并通过选修课的模块设计,使学生能够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规划组合专业方向。对于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学院鼓励其同时完成两个专业的学习,形成复合的专业或学位。学院把这一模式概括为“打通专业、自助培养、组合专业、复合学位”。

据了解,从2004年起,信息学院经过近5年的调研和讨论,从2009年初便已形成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系统改革方案,并从2009年实行。根据院方的分析报告,2009级学院内辅修第二学位和第二专业的人数占全院学生的10%,同时有5位学生辅修其他学院的专业,而2008级以往几乎没有辅修本院第二学位和专业的学生。改革后,信息学院学科相互交叉的天然优势得以发挥。

与此同时,理科试验班的学生学分绩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达到3.4、3.6、3.8的同学比例都逐年增加。学院分析认为,这得益于学生自主选择课程之后学习兴趣提高。

因材施教、深度培养

信息学院的分析报告中提到,“学生长期形成的依赖性使得很多学生面临自主选择时往往存在较多困惑”。如何让本科新生们进入大学后,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迅速适应,找到方向,人民大学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本科生导师制度。

2012年秋季,刚完成注册报到的法学院本

科新生接到了学院的特别通知,从2012年起,人民大学法学院全面恢复并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度。

法学院副院长王轶表示,“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是把学生培养成“他们想做,并且适合去做的人”。刚高中毕业的新生对法学专业、个人特点、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都没有清晰的了解。而本科生导师能根据自身阅历和经验指导这些学生。与研究生导师侧重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相比,本科生的导师重在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特点、所长和职业兴趣,规划未来发展。

“导师的指导既可以使学生的四年大学学习有针对性,又可以避免计划不周、选择失当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则强调了本科生导师在治学上对学生的帮助。

四年后要做什么?每位新生都必须思考。要提前规划,少听了“过来人”言。那么,本科生的导师无疑是最佳的“过来人”人选。导师可结合自身阅历向学生分析,对读研、出国深造和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作深入介绍,引导学生作出符合自身情况的选择,帮助学生摆脱迷茫,充分利用宝贵时光。对于那些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导师也可以提前给予其更多的学术指导,并帮助其寻找和把握学术交流的机会。

建立研究型学习制度

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均排名全国第

中国大学评论

为大学减负 从何做起

■尤小立

笔者在拙文《大学须重塑自尊》(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3年6月20日)中提到,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大学重塑自尊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给大学减负,那么这个“减负”应该从何做起呢?

要给大学减负的关键是重新调整大学管理的政策和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重新认识大学的社会功能。

大学乃教育机构是一个常识性的定位,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个常识性定位却因为种种复杂因素而显得并不清晰。

过去20年,中国大学从产业化、大众化、公司化,到GDP追求,每走一步都不是在事先周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

“摸着石头过河”一般是改革初级阶段的手段,所以在大学需要更上一层楼之时还传为金钟,正说明我们对于大学的常识性定位尚缺乏起码的尊重。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大学提升层级的障碍了。

影响定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学习或者说模仿的对象不稳定。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大多具有海外经历,每年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也不计其数,按理说应该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然而,我们的哪所大学真正地十年如一日地模仿国外一所名校?有哪所大学可以被誉称为“东方的哈佛”或“中国的牛津”?

在教育上,不卧薪尝胆地十年如一日地虚心学习,是很难取得人家的真经的。光想着巧妙地综合,所谓取长补短,取精华、去糟粕,在不具备良好判断能力和消化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大多是事倍功半,热闹有余而底气不足。

以论文为例。不可否认,我们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是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取得这个成就的代价却是教学越来越不受重视。

于是,有关部门又开始提倡重视本科教学,三令五申地要求教授承担本科生的课程,还搞了若干个奖项,以刺激教学水平的提高。而实际上,所有登上论文数量高台的学校都不情愿以降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排名来提高本科生的教学水平。

但问题在于,提高本科教学水平恰恰是大学向教育机构基本定位回归的一种表现。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为了追求一项指标而忽视了基本的定位;另一个问题则是,在当下现实中,要真正回归大学的基本定位是如何的困难。

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以科研提高教学水平,以教学和整体氛围影响和塑造学生人格的。如果我们承认大学的这个社会功能或者说社会义务仍然有效的,就不应该把附着于大学身上过多的,比如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之类的责任,不分主次地过度强调。

在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时代,一个学者能够在某一个专业的某个领域有所成就已经不错了。大学也一样,办出特色比大而全、样样精通更为现实,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会更高。

我们不希望大学里的佼佼者都被化整为零,既能研究和教学,擅长经营、社交,擅长整理申报材料和填表,又能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能运动员。

因此,重新调整管理大学的基本方针,就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回归到大学的基本定位之上,尽可能地减轻大学的主体之一——教师身上过多的负担,使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有相当的精力和能力,从容不迫地教学以及与学生相处。这也是“重视教学”的号召得以落实的前提。

大学减负的另一个方面是精简行政机构。上世纪90年代,大学“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曾经为大学减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取得过成功的经验。然而,榜样在前,步伐未进。现如今还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大学行政机构似乎一直在改革和变动,但改革和变动的结果却是行政人员越来越多。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学机构的调整和改革上。自从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许云志最早在南京大学倡导设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来,相同或类似的校级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但有趣的是,它们是否真的达到了像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优化组合研究人员,迅速提高研究水平的预期效果似乎尚不成问题。因为在一些学校,这类机构成立本身就是目的,就属于改革的重大成果。

为教师减负不仅需要政策倾斜,而且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起来也许需要时间。

因此,要减轻大学的负担,从精简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和不必要的科研机构做起,未必不是一条简单可行、切实有效的路。而且它符合现有的评价标准,可以量化,便于检查和考核。落实这一切,当然需要有关大学管理部门没有贯彻群众路线,满足广大师生深化大学改革的迫切愿望了。